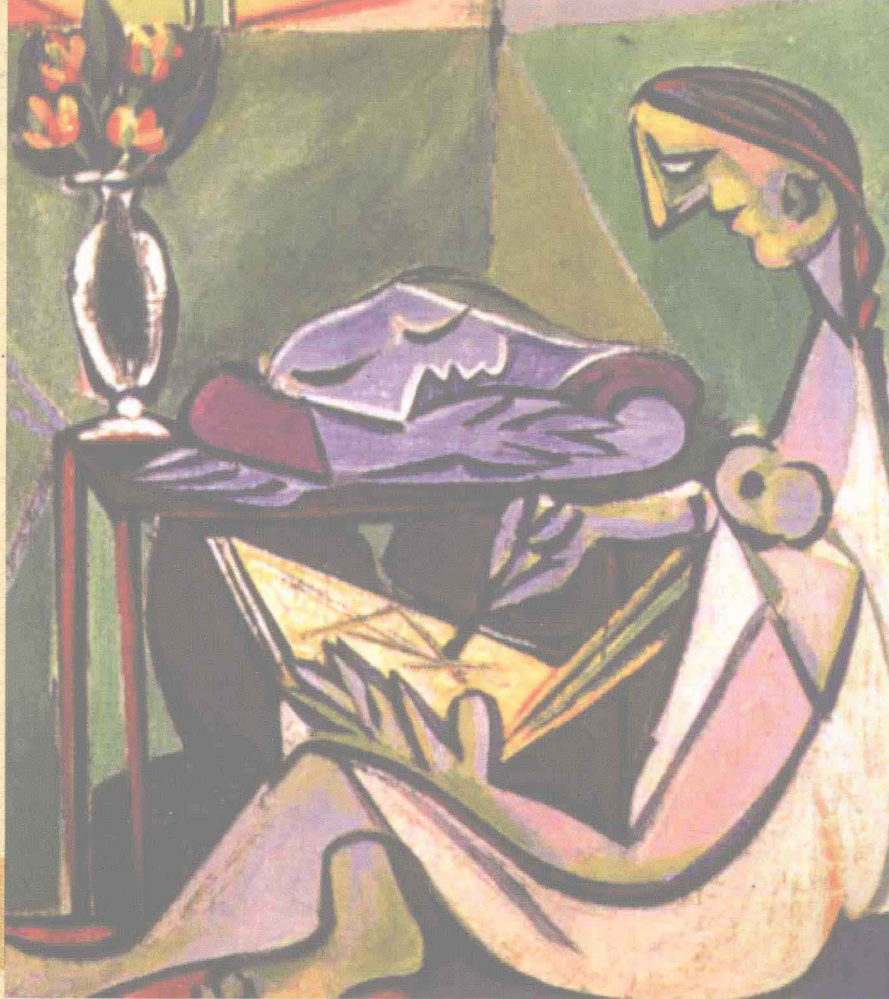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西学影印丛书·历史学系列

西方历史思想经典选读 (英文版)

Readings of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陈 恒 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西学影印丛书·历史学系列

西方历史思想经典选读 (英文版)

Readings of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陈 恒 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历史思想经典选读:英文/陈恒选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北京大学西学影印丛书·历史学系列)
ISBN 978-7-301-14007-9

I. 西… II. 陈… III. 史学史-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英文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6381 号

书 名: 西方历史思想经典选读

著作责任者: 陈 恒 选编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007-9/K · 052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980mm 16 开本 41.25 印张 836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导 言 西方历史思想的演进

- 历史与历史学
- 求真的希腊史学
- 实用的罗马史学
- 世界视野的犹太史学
- 上帝意识下的中世纪史学
- 从文艺复兴到人文主义
- 启蒙运动的史学成就
- 历史的辉格解释
- 职业化的兰克时代
- 哥白尼式的年鉴学派
- 后来居上的美国史学
-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 难以估量的新文化史

历史与历史学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两个问题是相伴而生的。简单地说,历史就是我们人类过去的经历。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过往经历天然有一种探究的欲望。“历史学之产生,是因为人类想认识自己,因为人类始终在关注生存的意义”^①,这就是人类历史能够存在的共同的基础。而对于人类过往经验的这种知识的探求就是历史学。所以,一般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经过历史学的研究而获得的历史知识。

一切自然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大到天体的演变、地质的变迁,小到花鸟虫鱼的生死,但自然史不同于我们人类的历史。历史学所关注的仅仅是人的活动,尽管他们的活动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

人们对于过往经历的关注、思考、鉴别和记录,亦即历史意识和历史知识的生成、发

^① 阿普比尔、亨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91页。

展和成熟,经过了由粗疏到精致的过程,中国如此,西方亦然。

就理想而言,人类一切的过往经历都可以成为历史学探究的对象;而就现实来说,以往的人类经历不可复现,我们所能研究的仅仅是遗存到现在的那些经历;再进一步来说,在一切人类经验遗存之中,引起研究者兴趣的那一部分遗存才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对象,在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成为研究对象之前,这些遗存严格说来还不是“历史”,而是跟其他自然物一样,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历史知识的增长,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不断深入,去伪存真,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不断有新的对象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对过往经历的知识越来越丰富。

就西方历史学来说,在早期社会,人类历史的基础是混沌,自然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与史诗;到了中世纪,宗教主宰了社会生活,于是就产生了众多以神学观为指导的历史著作;进入近代,自然科学变成了知识的至尊,历史学以贯彻实证主义精神、求得“科学”的一席之地为荣;在现代,不仅历史学的科学身份含混未定,就连“科学”自身的确定性地位也岌岌可危,使得人类重新反思历史知识的地位和价值。

求真的希腊史学 古代地中海世界汇聚着众多的民族。一些民族没有保存纪录,因此也就没有可以发现的历史;另一些民族比如苏美尔人、埃及人、赫梯人和亚述人等虽然流传下来了文字材料(其中有些材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千纪、2千纪):征服者想为他们的后代记录自己胜利的材料;对消逝的过去也有着兴趣,特别是对谱系感兴趣,以歌颂王室祖先及其成就的材料。但这些文字材料大多缺乏批判意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对西方史学发展影响不大。

往昔事件的记录与解释开始于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荷马史诗》实际就是口述史,虽然它并非史学著作,荷马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他笔下的人物深藏历史意识:有一种强烈的动力驱使他们想把辉煌留给后代,因此阿喀琉斯要唱颂英雄们的业绩。而且诗人本人也深知要把现在的人与他所描述世界的人相比较。

古希腊最早的一批历史学家是公元前6世纪在爱奥尼亚出现的那些史话家(logographers)^①,就是讲故事的人。这些史话家像早期自然科学哲学家一样认为通过自己的调查(historia,希腊语含义就是“通过探询发现知识”,可见这是科学的而不是诗性的调查)就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份关于人类活动的可靠叙述。其中最著名的史话家是米利都的赫卡泰戊斯(Hecataeus of Miletus),著有《谱系》、《寰宇旅行》。他公开宣称知识的独立性:“我写的东西在我看来是真实的,因为在我看来许多希腊人的传说是荒谬的。”^②这种精神为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继承。他们发动了一场“知识革命”,以理性解

① 见 M. C. Howatson and Ian Chilvers 主编, *The Concis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logographers” 辞条,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见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ed. John Roberts, “Hecataeus” 辞条,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释过去,对现象进行理解。希罗多德作为希腊史学传统的奠基者,他对历史编撰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首先,他对材料进行批判以区别历史时间;其次,他介绍帝国延续的观念,这就为直到19世纪欧洲的世界史提供了基本框架;再次,希罗多德认为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立历史,并建立了要依靠各自民族材料来撰写各个民族历史的原则。尽管希罗多德的实践并不总是等同于他的原则,但他的《历史》一直是整个古代世界历史编撰的范式。^①修昔底德熟知希罗多德,两者之间也有相似性,比如两者在演说辞方面都模仿了荷马。但两者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相似:希罗多德的风格是平易、流畅而有说服力。修昔底德的风格是粗硬、造作而令人反感。^②希罗多德关注的是社会与文化,视野广阔;而修昔底德关注的内容更加狭隘,仅仅是战争和政治。

西部希腊世界,也就是意大利和西西里地区也发展出自己的历史学,这里的历史学从东部希腊世界借鉴了不少东西,并与之发生相互影响。叙拉古的安条克(Antiochus of Syracuse)^③的历史著作就补充了希罗多德对西部世界的遗漏;反过来,安条克的著作又被修昔底德所利用;修昔底德后来又成为叙拉古的菲里斯图斯(Philistus of Syracuse,约公元前430—前356年)的楷模,古代批评家认为他是修昔底德的模仿者。尽管西西里是一个不小的地方,安条克和菲里斯图斯的眼光也不狭隘,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地方史学家。与此类似,一些地方史学家也研究那些伟大的城邦,而且编撰了阿提得斯(Atthides)或雅典史这样的著作。第一位雅典年代史家(Atthidographer)不是雅典人,而是莱斯博斯岛上米提林的赫兰尼库斯(Hellanicus of Mytilene)。但公元前4世纪、前3世纪伟大的雅典年代史家安德洛提昂(Androtion)、斐洛克鲁斯(Philochorus)都是雅典人。^④

然而,修昔底德之后的希腊史学主流是那些见多识广、云游四方的作家的著作,比如被放逐的雅典人色诺芬(Xenophon)的著作。他的《希腊史》虽然关注的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但他的视野是广泛的,不能被称为地方史。虽然他从修昔底德那里汲取养料,但他的宗教观念和他游离主题的叙述手法让人想到希罗多德的著作。《远征记》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社会史学家的天赋。

修昔底德的影响从没有消失。卡里斯提尼(Callisthenes)讨论了修昔底德的演说。欧

① 见 William H. McNeill 主编, *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Stanley M. Burstein 撰写的“Herodotus”辞条, Vol. 3, p.900,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 2005。

②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3页。

③ 希腊历史学家,活动时间在公元前420年前后。关于他的生平几乎一无所知,他的著作虽然仅有残篇存留,但因其准确而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西西里史》(*History of Sicily*)叙述的时间范围从远古到公元前424年,为修昔底德采用,他的《意大利殖民》(*Colonizing of Italy*)经常为斯特拉波(Strabo)、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提到。

④ 见 John Roberts 主编,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Androtion”辞条,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弗洛斯(Ephorus)的通史在古代世界非常流行,他主要是利用前5世纪的修昔底德、奥克西林库斯历史学家^①、卡里斯提尼等人的著作。欧弗洛斯是通过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Diodorus Siculus)的著作传到我们这里的。欧弗洛斯对西西里有详细的记载,但很难确定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提麦欧(Timaeus),提麦欧是希腊理解地中海西部世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另一位修昔底德继承者、模仿者(模仿修昔底德的葬礼演说)是提奥庞培斯(Theopompus),他撰写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历史。那个时代的伟人是亚历山大大帝,这位在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当代阿喀琉斯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希腊化时代。^②

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未来的西方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比如,这时的历史学家开始注意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希腊史学自开始之日就把记载和解释同自然环境密切结合起来,亚历山大的远征更拓宽了希腊史家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因此也出现了像墨西拿的凯尔库斯(Dicaearchus of Messine,约公元前350—前285年)《希腊生活》这样的著作(已佚失)。凯尔库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运用老师的初步生物进化思想解释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他认为人类在不停地进化,不断地增强征服自然的能力,但社会却在退化,出现了战争之类的邪恶。这本著作实际上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专门性的社会文化史。^③再如,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0—前118年)也把地理、气候问题当作解释历史的基本原则。波里比阿认为,社会是不断经过成长、衰退、消亡这一循环的,低下的出生率会造成社会的衰落,因此,他警告罗马贵族注意人口的不断下降。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Diodorus Siculus,约公元前90—前21年)也注意环境问题,他注意到尼罗河的源头以及它的神秘泛滥,这一切都影响着埃及人的意识。^④而斯特拉波(Strabo)则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把地理和气候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推动者。

希腊化时代的史家不仅仅停留在古典时代的访问目击者证词的方法上,而是进而编纂,从以前史家的著作中摘录出所需要的材料,进行必要的考证、判断,然后按照自己的史学观念撰写成书。换言之,这时的史学出现了学术化的倾向,即历史从创作走向编纂。作为学术研究事业的历史学开始了,历史研究者人人都要成为博古通今的学问家。^⑤希腊

① 奥克西林库斯历史学家(Oxyrhynchus historian),不知其名的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残篇于1906年在埃及的奥克西林库斯纸草(Oxyrhynchus Papyri)中发现,包含大约900句散文,涉及公元前396—前395年希腊世界的许多细节。这一发现使人们意识到在狄奥多洛斯和奥克西林库斯历史学家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后来考证的结果是:狄奥多洛斯所取材的对象Ephorus,其著作中引用了奥克西林库斯历史学家。

② Simon Hornblower与Antony Spawforth主编,《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Civilization》,Simon Hornblower撰写“Greek historiography”辞条,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③ 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5页。

④ 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64页。

⑤ 布莱萨赫就认为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是学术研究。见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Seco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30。

化时代史学的专业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一)对文献版本的编辑与注释;(二)搜集各个城邦、地区、圣殿、神祇、公共机构的早期传统;(三)对纪念碑、铭刻进行系统的复制与描述;(四)编辑内容丰富的人物传记;(五)编辑年表。^①

从这一时期史学专业化的趋势来看,表现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身上的求真、探索精神确实衰落了。但波里比阿是例外,他把希腊史学的优良传统输入到了罗马世界。

实用的罗马史学 历史不仅仅是记忆的简单复制,对罗马过去的记述深深根置于罗马的现状,因此,罗马历史学家通常比希腊作家更加关注公众,他们渴望在公共生活中帮助当代读者、激发当代读者,往昔时常被铸造为当代事件的训例,或者以当代术语重新解释。可见,罗马人渴望集体记忆甚于个人经验。他们重视罗马建城史,把大量笔墨花在开端和当代事件上,而有关在这两者之间的历史的叙述则极其简单:这一特点在罗马第一位史学家皮克托(Fabius Pictor,约前200年,以希腊语写作,其著作残存于他的继承者著作中,大多是建城的历史)的著作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波里比阿、狄奥尼修斯和李维都引用他的著作。^②另一方面,罗马盛行的是编年史,记录的主要内容是一系列的征兆、官员的列表、军事的胜利等等。

萨卢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约公元前86—前35年)的《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则摒弃了编年形式,发展出了历史专论,使用两个有趣的历史事件来阐述主题的广泛意义,说明道德的衰落。他的分析高度浓缩,结构巧妙,并形成了适当的风格:简洁、警世、粗放、跌宕。同时,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前44年)写出了另一种形式的专题著作《高卢战记》,不过这类“随笔”(commentarii)形式不在主流之列。波利奥(Asinius Pollio,公元前76—公元4年)撰写了(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以及这之前的内战,叙述时间起于公元前60年。他尖锐、独立的分析影响了晚期希腊历史学家阿里安(Arrian)、普鲁塔克(Plutarch)的观念。

但波利奥本身在罗马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维(Titus Livius,即Livy,约公元前59—公元17年)142卷的罗马建城史(*Ab Urbe Condita*,即《建城以来史》)一直笼罩着这一领域。李维以更加恰当的方式处理了过去与现在:这部历史书很大一部分叙述的是当代之前的事件,就像李维在其序言中所说,部分是因为衰落相对来说是近来的事情,而最好的民族榜样是能够在先前几个世纪里找到的。然而,李维的分析带有许多罗马人的偏见,他是一位民族沙文主义者。在他看来,罗马人是个“天命所归”的民族。地中海世界之被罗马所统一,实乃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③如果说李维的著作把过去浪漫化了,那么塔西佗的著作则暴露了令人沮丧的现实。

① 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67.

② 见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 版), “Quintus Fabius Pictor” 辞条。

③ 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在罗马帝国早期元首政治的高压之下,历史学家们明白他们应该自我调整以适应新世界,适应罗马人在新世界所取得的成就。于是,帝国的历史学总是处于沦为给帝国人物书写传记的危险之中;这种情况自帕特爾库魯斯(Velleius Paterculus,公元前19—公元30年)以来就非常明显,从公元2世纪起,传记这一形式就一直笼罩着历史学领域。帕特爾库魯斯关注的人物是恺撒、奥古斯都、提比略,他对新世界的狂热与克度斯(Cremutius Cordus,逝于公元25年)对旧世界的眷恋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克度斯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①;而老塞涅卡则以更加安全的方式应对着从共和向元首政治的转变。

塔西佗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拉丁历史学家,也被认为是以拉丁文写作的最伟大的文学家,他对历史文献的娴熟处理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现代学者一直在认真研究塔西佗的著作,以期藉此重构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塔西佗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常传统的:保持编年史的形式;选择相对比较近的事件;不仅撰写皇帝和宫廷,而且也撰写元老和将军。但塔西佗是一位有自觉意识的文学风格作家,他以雄壮的风格进行写作,绚烂、锐利的修辞和动人的分析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足,擅长诗化罗马传统并严肃地加以使用,他的思想和表达方法使他的著作栩栩如生。他的风格就像他的思想一样避免了虚假的空洞。他的著作简明、句子跌宕起伏。希腊史学已定义了描述历史的方法:能以朴实的语言分析事件、能以人物个性设置场景、能提供人类行为的戏剧魅力。塔西佗知道这些技巧,并综合利用这些技巧来为他的政治解释服务;他把早期罗马历史学家萨卢斯特当作楷模进行研究。^②

塔西佗的著作虽然没有能为早期帝国史学概括提供一个详细的材料,其政治观念在统治圈内也是不流行的。但他受到广泛地欢迎,他的著作直到4世纪还被模仿。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330—395)继承了塔西佗的风格,他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拉丁历史学家。^③

世界视野的犹太史学 西方历史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犹太人、希腊人和早期基督教徒的贡献。希腊人并不是最早编撰历史的民族,犹太人《旧约圣经》中的《撒母耳记》、《列王纪》中的“继位叙述”就先于希腊世界的历史记录。但《旧约圣经》所叙述的大多数是神事而非人事,——推动历史的是神圣的力量。犹太人比古代其他民族更重视历史,他们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历史观念。他们(以及后来的基督徒)善于对过去的事件赋加某种意义、结构和过程,在他们看来,过去的事件与当前的、未来的事件混合在一起,朝着一种特定的目标前进。历史是前进的,这就突破了古代世界的循环史观。如果说

① 据说克度斯称恺撒的谋杀者卡西厄斯(Cassius)为“最后的罗马人”,罗马皇帝提比略因此起诉他时,他自杀了。克度斯著有公元1世纪的罗马史,已遗失。

② 见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5版), Alexander Hugh McDonald 撰写的“Tacitus”辞条。

③ John Roberts 主编,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Roman historiography” 辞条,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犹太人的历史著述是宗教经验与信仰的产物,那么希腊人的历史著述则是批评与理性探询的产物。希腊人擅长以批评的、科学的方法来审视过去,以确定真理。对希腊人来说,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虽然神话、传说、寓言可以满足古代人想知道其起源和前辈的愿望,但神话毕竟是以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人类社会,只是历史的前奏。

犹太民族是古代世界为数不多的有历史感的民族之一,他们编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民族史。这种历史感源自一个独特的、难以令人忘记的事件——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离开埃及(见《旧约·出埃及记》)。《圣经》一开始便是“创世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构建人类通史的记录。这个故事声称历史有开端,也有目的。这与其他文明社会把时间的展开视为一系列的循环往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犹太人的普世史观打破了希腊人、罗马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部观念。基督教不仅传承了犹太人的世界史观,而且加以改进,以适合自身需要。公元5世纪,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把历史呈现为朝向上帝之城的不断进步,在一定意义上,后世各种进步观的理论之源都可以追溯到这里。

上帝意识下的中世纪史学 早期教会史兴起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为了教导信徒,二是为了与异教徒展开辩论^①,而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更促进了教会史的写作。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约260—339)是早期教会史学家,被称为“教会史之父”,著有《教会史》。中世纪的历史著作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史,这类著作以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②为指南,人们不断从中获得灵感。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5世纪早期)的《反异教史》对此做了生动的说明;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约560—636)的著作也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编年史(chronicle),从粗拙、简单的地方修道院年代记(annals)^③到组织严谨、条理清晰的叙述,比如萨克索·格拉马狄库斯(Saxo Grammaticus,鼎盛于12世纪—13世纪早期)、弗莱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约1111—1158)、温德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逝于1236)、巴黎的马修(Matthew of Paris,逝于1259)等人的著作。这两类不同题材的历史著作又常常混合在一起,以尝试编撰更广泛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比如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490—约585)的《哥特人史》、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538—594)的《法兰克人史》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早期尝试,但鲜有继承者。由于这时的学问主要局限于教会,编年史家因而比较关注教会,不太关心世俗政治与统治者。比如比德(Beda Venerabilis,约672—735)的《英吉利教会史》就属于这一模式。

与拜占庭和穆斯林的接触使西方世界了解了其他民族的观念,也拓展了西方历史学

① 张广智、陈新:《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② 《上帝之城》是奥古斯丁对410年罗马陷落的回应,该书写于413—426年间。在一千多年的中世纪,欧洲一直深受奥古斯丁思想的影响。

③ 直到14世纪人们才弄清了编年史、年代纪和历史学之间的区别。见John Cannon等主编,《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Historians》,“chronicles and annals”辞条,Oxford:Blackwell Reference,1988。

的编撰范围。尽管拜占庭帝国国土广袤、文化统一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拜占庭的史学著作更多的文化质地,拜占庭早期的历史学家们也同样陷入了编年史写作,从普洛科匹乌斯(Procopius,约500—?)、安娜·康敏娜(Anna Comnena,1083—约1153)到13世纪的乔治·阿克洛波里塔(George Acropolita)和阿克米纳图斯兄弟(Acominatus),都是如此。中世纪伊斯兰历史学家泰伯里(al-Tabari,838—923)撰写了编年史,记录从创世到915年的世界史;马苏弟(al-Masudi)的历史著作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时常用复杂的方法把事实与虚构区分开来。中世纪最伟大的阿拉伯历史学家是伊本·卡尔顿(Ibn Khaldun,1332—1406),他描述城市与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开创了早期意义上的历史社会学,并且创造了历史分析理论。到12世纪,欧洲也出现了世俗历史写作,这表现在杰弗里·德·维尔阿杜安(Geoffroi de Villehardouin,约1150—1213)的著作之中,以及随后几个世纪中的让·儒安维尔(Jean sire de Joinville,约1224—1317)、让·傅华萨(Jean Froissart,约1333—1440)、菲利普·德·柯敏斯(Philippe de Comines,约1447—1511)的编年史之中。^①

中世纪史学传统修正了希腊史学观念,把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嵌入历史之中。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近代世界。到14世纪,这类著作已成为不断反复的形式主义著作了。总的来说,中世纪史家缺乏使用原始材料的知识和能力。就因为这个原因,作为知识体系的历史学在中世纪大学里并没有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况在14世纪至19世纪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历史学在此期间获得了学术地位^②,近代的历史意识由此起源。^③

从文艺复兴到人文主义 15世纪意大利对希腊罗马文学艺术的挚爱对这一时期历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鼓励人们以世俗的、现实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布鲁尼(Leonardo Bruni,约1370—1444),这位新近发现塔西佗著作的学者在研究罗马共和时代、帝国时代的历史时,认为可以根据罗马的经验来撰写佛罗伦萨的历史。到16世纪,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和奎恰尔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的著作都特别突出政治史,他们对国家及其统治者进行了政治分析。教会史与世俗史明显地区分开了。

在16世纪,历史著作的主要形式是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人文主义者所遵循的是古典传统而不是中世纪编年传统,他们模仿古典作家,擅长叙述。恺撒、塔西佗、李维、苏维托尼乌斯等人都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比如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保鲁斯·埃米利乌斯(Paulus Aemilius,约1455—1529)的《法兰克人的业绩》(*Gesta Francorum*,约1520)就是模仿李维,书中安插了演说辞,借助主人公之口来表达著作的意图。再比如士兵蒙吕克(Blaise

① 见 *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History” 辞条,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Gilderhus, Mark T., *History and Historians: A Histor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p.26.

③ 中世纪的史学观念不同于近代的史学观念。比如我们当代人所理解的客观性(objectivity)与真实性(truthfulness)问题在中世纪并不存在。大多数中世纪编年史家认为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讲述真理的意图是极其主要的。普洛科匹乌斯(Procopius)宣称,“只有真理是适合历史的”。巴黎的马修(Matthew Paris)非常强烈地反对撒谎的历史学家,“假如他们写出不真实的作品,上帝是不会接纳他们的”。

de Monluc, 1501—1577)的《随笔》(*Commentaires*, 1592)——被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称为“士兵的圣经”——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恺撒的。人文主义史学另一个重要的形式是对制度史的研究,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律师巴斯基耶(Étienne Pasquier, 1529—1615)的著作《法国研究》(*Recherches de la France*, 1560)。波丹(Jean Bodin, 1530—1596)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1566)则反映了各种政府形式的发展。

古典史学强调文学技巧、强调对历史的解释,实际上这是强调历史的基础研究。因此,从16世纪起,欧洲各地的学者积极投身于各自民族史、宗教史材料的系统收集与整理上。法国本笃会僧侣特别是马比荣(Jean Mabillon, 1632—1707)、蒙福孔(Bernard de Montfaucon, 1655—1741)彻底整理并出版了教会史的材料。穆拉托里(Ludovico Muratori, 1672—1750)收集了意大利史的材料。莱布尼兹(Leibniz, 1646—1716)编辑了中世纪德国编年史,奥地利人埃克尔(Joseph Eckhel, 1737—1798)建立了钱币学研究。戴尔(William Dugdale, 1605—1686)、坦纳(Thomas Tanner, 1674—1735)、赫恩(Thomas Hearne, 1678—1735)收集了英格兰的文献与铭文,并编辑了中世纪编年史。这些事例所代表的仅仅是众多古物研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这些记录详细的著作保存了历史知识的原始材料,建立了诸如外交、钱币、考古这类学科的批判性研究领域。

启蒙运动的史学成就 笼罩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研究的许多特点在18世纪启蒙时代得到了发展,这就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怀疑精神。随着对世俗理性的崇拜,人类越来越相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衰落的概念已为进步的观念所取代——相信历史变化在不断地改进人类社会。意大利的维柯(1668—1744)在《新科学》(1725)中特别强调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像其文艺复兴的前辈一样,维柯也发展出一种历史循环理论。^①维柯认为,埃及人所经历的神祇、英雄、人类这三个时代是每个民族都要经历的阶段。这三个时代有三种不同的自然本性、习俗、自然法、政体、语言、字母、法学、权威、理性等。^②每一个阶段都代表着“从神秘神学”到“自然公平”的逐渐进步。维柯观念的关键是进步和完全、非理智对理智、非理性对理性。然而,维柯这些观念不同于法国哲学家笛卡儿(Descartes, 1596—1650)。笛卡儿宣称世界上只有自然哲学(科学)是人类可获得的知识,因为只有自然哲学能够从经验上加以验证。与此相反,维柯之前的哲学家都认为仅仅是上帝能够理解社会变化的规律,因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维柯则认为由于上帝创造了自然界,因而他仅仅能明白自然界的真正意义;但由于人形成了人类社会,对于人类来说是能够理解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

① 首先由维柯复活的循环史观,影响了西方世界很长时间,几代人之后仍旧可以看到这种影响。比如黑格尔的主题就是每个时代的发展都是由“有世界历史的民族”支配的,不论是希腊人、罗马人,还是日耳曼人都是如此。

②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59页以下。

像维柯一样,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1724—1804)也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哲学。^①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一文是18世纪典型的为历史变化设计出的全面计划。康德认为,“历史学是从事于叙述这些表现的;不管它们的原因可能是多么地隐蔽,但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的禀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②康德相信进步的观念,也渴望发现历史计划——是什么让历史以其发展的方式来发展的。康德的理念一直影响到当今的社会理论家、历史学家。

由启蒙思想所激发的历史哲学观念最终使历史学与注重细节的古文物研究分野了。法国的伏尔泰(1694—1778)、英国的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1768—1751)各自表达了把历史当作纯文学的概念,把历史当作是“通过例证进行教导的哲学”这一概念。读者阅读历史著作的兴趣在不断增加。他们为大量的、当下的读者进行写作,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商业效应,这和只为朋友和身后的公众进行写作的古典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伏尔泰的《查理十二史》(1731)获得了大量读者,第一版在头两年就发行了十次之多。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功。虽然伏尔泰的著作几乎涵盖了文明的方方面面,但他忽略了古典传统对政治的关注,在学术细节方面也有所不足。启蒙运动史学家,比如孟德斯鸠、孔多塞继续发扬宏大叙事的方法,但同样继续忽略了对证据的仔细评估。

历史研究在英格兰也得到很快发展,这里的学者不仅研究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而且研究刚刚逝去的历史,特别是17世纪的历史,成为他们研究和谈论的焦点。苏格兰牧师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的著作《查理四世统治时代史》让他名扬欧洲,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霍尔巴赫(D'Holbach)、伏尔泰曾高度赞扬他,马德里、帕多瓦、圣彼得堡的研究院都选他当院士。苏格兰哲学家、托利党历史学家休谟(1711—1776)生前就以6卷本的《英格兰史》(1751—1762)闻名于世,该书吸引了众多读者,也使作者拿到了相当可观的版税。休谟特别重视道德教训,认为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会留给后代道德教训;该书也包含一些社会史方面的内容。上帝在社会思想中的作用比较少了,但要说这个时代的历史著作完全没有某种宗教意图,那是错误的。这一点在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1758)中可以看出。再比如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批评者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遗著《关于英国史删节本的评论》(*Essay towards an Abridgement of the English History*,1757—1760),就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于天意(Providence)。

① 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对历史和历史学问题的哲学反思。伏尔泰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哲学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是从宏观上研究历史的进程,主要目的是对这一进程提出全面的阐述。代表人物有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到20世纪早期,历史哲学进入第二阶段,即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关注的对象转向历史学自身,研究历史知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代表人物有狄尔泰(Dilthey)、克罗齐(Croce)、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等。1970年代之后,历史知识的叙述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焦点。代表人物主要有海登·怀特(Hyden White)、安克斯密特(F. Ankersmit)等。

②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页。

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当属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 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为历史写作树立了一个典范, 该书极富文采, 又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野心勃勃、范围广泛、学术性强的著作遭受了批评, 也取得了商业成功。他以一种清晰的叙述方式把那些有趣的人与事、跌宕起伏的事件、极具戏剧效果的细节呈现给读者。历史在这里不仅被当作是讲故事, 提供让人欢娱的叙述, 而且被当作道德指南, 是可以提供有益教训的源泉。

此外, 这一时期也存在对历史进行客观公正探究的强烈兴趣, 特别是强调历史学是学术研究。在德国, 拉丁人文主义的史学传统非常活跃。西西里牧师格雷哥里奥(Rosario Gregorio)使用学术的方法来挑战中世纪关于这个岛屿的虚假观点。在瑞典, 达林(Olof von Dalin, 1708—1763)写了一本学术著作《瑞典史》, 目的是驳斥瑞典早期历史是遵奉哥特风格者的神话。朗格布林(Sven Lagerbring, 1707—1787)则把对原始材料进行批评的方法引入了瑞典史。^①

历史的辉格解释 辉格史学这一概念是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在《历史的辉格解释》(1931)一书中首先提出的, 它源于英国的辉格党, 该党赞同议会权力, 反对赞成国王权力、贵族政治的托利党。^②这一术语被广泛地应用到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比如科学史的研究), 来批评任何持有特定目的、以英雄为基础的历史观。最著名的辉格派史学家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 1800—1859), 其名著《自詹姆士二世就职以来的英国史》开头便表达了由辉格派原则指导下的英国历史研究方法。

辉格史学把过去视为有目的的、朝向现在的进程。一般而言, 辉格史学家赞同历史上的宪制政府、个人自由。这个术语时常被用来指示任何持有这类观念的历史学家。^③其对立方面可以被视为某种文化悲观主义。辉格史学的特征是民族性, 善于制造民族神话, 这是19世纪史学一个重要现象。民族主义关注的是国家事务, 民族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这些事务。实际上, 这一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都与这种观念有关——约翰·罗素(Lord John Russell, 1792—1878)、亨利·哈兰姆(Henry Hallam, 1777—1859)、威廉·列基(William

① 值得注意的是, “18世纪历史研究仍然使用剪刀加糨糊的方法。历史学家仍然忙于知道在他所感兴趣的那个问题上‘权威们’是怎么说的, 并用他自己的方式和他自己的解释重复那些说法”。可见这一时期的史学距离现代意义的史学还有一定距离。见柯林武德:《形而上学论》, 宫睿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78页。

② 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是17世纪末两个正在形成中的英国政党, 辉格、托利是各自对对方的蔑称。“辉格”意为“马贼”。“托利”意为“不法之徒”。1679年, 议会就詹姆士公爵(即后来的詹姆士二世)是否有权继承英国王位展开激烈争论, 赞成者被称为“托利”, 反对者被称为“辉格”。后来双方各自以此自称。随着时间的发展, 双方观点有所变化, 辉格党不再完全否定君主制; 托利党也不再坚决拥护君主制。结果导致君主立宪制的建立。辉格党在18世纪上半期占优势, 托利党在18世纪后半期占优势。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 托利党改称保守党, 辉格党改称自由党。

③ 人们常常把这种传统称为辉格传统(The Whig Tradition)、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辉格史学(Whiggish historiography)或辉格史家(Whig Historian)等等。抽象名词 Whiggishness 有时就被用作辉格史学的风格术语。

Lecky, 1838—1903)的著述都有这种风格。这一时期其他杰出的辉格历史学家包括弗里曼(E. A. Freeman, 1823—1892)、弗劳德(J. A. Froude, 1818—1894)、屈维廉(G. O. Trevelyan, 1838—1928)等。

职业化的兰克时代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是客观主义史学的鼻祖、近代史学之父^①,也是职业史学的肇始者。除了兰克的爱国热忱,影响他的历史研究的还有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 1776—1831,著有《罗马史》,该书宣布了近代科学历史方法的诞生)、赫尔德(Herder, 1744—180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把历史当作是人类进步的历史)以及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 1775—1854,德国哲学家,他的哲学有着强烈的宗教动机)。司各脱(Walter Scott, 1771—1832)的历史小说也对兰克产生了极大影响。^②兰克把历史定义为绝对历史事实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仔细的、系统的研究——收集事实、编排事实——可以发现绝对的历史事实。历史因此获得了“科学客观性”的桂冠。

兰克的目的是如实地重建历史,避免把当代精神注入到先前时代的历史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兰克坚持认为只有当时的记述及其相关材料才能够被当作原始材料,这就需要穷竭档案研究,依靠对材料的语言学批评,他本人就多次到维也纳、意大利研究那里的国家档案。可以说,是兰克开创了档案研究和史料分析之先河,因而,他的这种观念与方法往往被当作是“近代史学”的开端。他试图解释“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这一方法不但笼罩着德国历史思想,而且笼罩着历史思想以外的学科。兰克想通过对原始材料小心翼翼的甄别来呈现一副质朴的历史事实画面。然而,他倾向强调政治史,关注国王和领袖的事迹,忽略了经济和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兰克的这种“科学的历史”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但客观上导致了对民族史料的系统收集与分类,比如1825—1925年间出版的《德意志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e*)。^③

兰克的影响在19世纪下半期达到顶峰。1865年,兰克被加封爵位,成为贵族;1882年成为枢密院顾问官。当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95—1861)在1857年精神病发作时,兰

① Peter Lambert and Phillipp Schofield, ed., *Making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s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2004, p.11.

② 1885年,90高龄的兰克不能够阅读了、记忆力也下降了,也难以写作,但他向其忠诚的助手口述:他是怎样在年轻时代对历史感兴趣的、他的大学教师生涯、对哲学著作的阅读、对司各脱历史小说的喜爱。关于最后一个话题,兰克说:“我带着强烈的兴趣阅读这些著作;但是我也对这些著作表示异议。我被书中对待大胆查理、路易十一的叙述方式反感,这似乎是……与历史文献完全矛盾的。我研究……当代报告……变得相信斯科特所刻画的大胆查理或路易十一一类人物形象是从不存在的……比较使我确信历史文献本身是更加完美的,在任何情况下也是比浪漫虚构更有趣的。我完全从小说中抽身而去,决心在我的著作中避免任何虚构和想象,并严格遵守事实”。转引自John H. Arnold,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2000, p.34.

③ 到19世纪中叶,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开始作为文化民族主义者从事历史撰述,以构建各自民族起源、悲剧和辉煌的史诗篇章,他们视自身的主要任务就是叙述各自民族国家的宪法史、外交史、军事史和行政史。

克最终退出了政治生活,在1871年他的妻子去世后,他连社会生活也回绝了。越来越退化的视力迫使他变成了一位孤独的学者,只能依靠助手工作。^①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82岁高龄的兰克开始宣布要编撰他的最伟大的著作《世界史》(9卷,1881—1888),该书一直叙述到15世纪,从而践履了他在年轻时代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讲述“世界历史的故事”。这不是一部批判研究的著作,也不是一部历史思辨、哲学思辨的著作,而是一部叙述范围广泛的文化演进的著作,从希腊人一直叙述到拉丁—日耳曼民族,这实际上是一部欧洲诸民族史,在这部历史中非欧洲世界顶多是以边缘的面目出现。兰克著述范围广泛,第一本著作是《1494—1514年间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1824),另著有《16、17世纪教皇史》(1834—1836)、《德国宗教改革史》(1839—1847)、《16、17世纪法国的内战和君主制》(1852)等。德文版《兰克全集》(1867—1890)多达54卷,还不包括《世界史》。与其说兰克的著作、学说影响很大,不如说兰克所采取的教学手段影响更大。作为柏林大学教授(1825—1871),他在历史教学中开辟了系统的研讨班(seminar)方法,培养了一整代历史学家,而这些历史学家又在全世界传播了兰克的方法。在德国以外,兰克的思想所影响巨大的地方是英国和美国。^②

兰克研究历史方法最直接的影响表现在教会史领域。德国学者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 1808—1874)在《耶稣传》(2卷,1835)中认为福音书并不是历史,仅仅是在罗马时代反映犹太神话虚构的故事。该书发行广泛、影响极大,也引起了炽热的争论。在19世纪40年代,受施特劳斯的影响出版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著作,其中一些著作就宣称历史上从不存在耶稣其人。^③兰克的著作与观念不仅笼罩着德国史学,而且也影响了许多在德国学习的外国历史学家。不幸的是,兰克的弟子中很多人只是延续、推崇兰克的观念,没有赋予这些观念广泛的意义。^④20世纪早期,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 Becker, 1873—1945)、比尔德夫妇(Charles Beard and Mary Beard)等人挑战兰克所提出的那种绝对的历史观念。贝克尔之名言“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是历史相对主义的陈述,这表明历史是一种时空的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欧洲史学并不是兰克一统天下,欧洲许多历史学家都在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比如法国的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瑞士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都比那些经验主义政治史家拥有着更广泛的历史观念。布克哈特的历史研究关注的是宗教、文化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米什莱则呼吁历史学家研

① 见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 版), Rudolf Vierhaus 撰写的“Leopold von Ranke”辞条。

② 已经翻译为英语的著作有 *Ecclesiastic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opes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3 vol., 1840)、*Memoirs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 and History of Prussia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3 vol., 1847—48)、*Civil Wars and Monarchy in Franc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1852)、*History of England* (6 vol., 1875)。

③ Lynn Hunt, et al., *The Making of the West: Peoples and Cultures*, vol. c., Bedford / St. Martin's, 2001, p. 832.

④ 见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 版), “Leopold von Ranke”辞条。

究“那些遭受苦楚、辛苦劳作、衰落、消亡而又没有去记录的那些人”^①。法国史学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的名著《古代城市》(1864),主要关注的是古代希腊和罗马初期的宗教、家庭与道德,而不是政治和国家问题。

这一时期另一种形式的“科学的历史”是实证主义史学。19世纪的欧洲不仅是经验主义的时代,也是实证主义的时代。实证主义哲学持有这样一种理念,社会学家像自然科学家一样能够获得经验数据,可以把握连接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大多数激进的实证主义者而言,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是能够导致人类社会发展和变迁之完美规律的表达。换句话说,假如人类能够理解支配往昔社会变迁的规律,人类也就能理解未来将向何处发展。首先把这一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是法国思想家孔德(1798—1857),他为他新近建立的这门学科铸造了一个新词“sociology”(社会学)。孔德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神学阶段,上帝的影响处处存在;二、形而上学阶段,人类开始寻求可供选择的世界观;三、实证阶段,这时人类已经有了理性的方法(经验主义),以科学家理解自然世界的方式来研究人类社会。当时所强调的重点是,发现支配进步的规律以全面理解社会各种现象。法国的泰纳(Hippolyte Taine, 1828—1893)、英国的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是在历史学中贯彻实证主义精神的代表。他们坚信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运用于历史研究,历史学可以建设成一门合格的科学。

这一时期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分工协作。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 1834—1902)主编的《剑桥近代史》体现了历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也笼罩着德国史学界。然而,在法国,合作的观念拓展得越来越广。比如亨利·贝尔(Henri Berr, 1863—1954)在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Revue Synthèse Historique*)杂志,就提倡其他领域的专家尤其是提倡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参与历史研究。贝尔发起了规模巨大的专题研究系列丛书《人类进化》(*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65卷, 1920—1954),就像题目所表示的,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要表达人类自史前社会以来的人类发展。贝尔的目的为了科学的历史学,他的兴趣在于“历史的”或“集体的心理学”,对后来的年鉴学派史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因此也被认为是“心理史学”的先驱。

到19世纪晚期,历史已成为职业化^②的学科:各个大学纷纷建立了历史系,组成了各类历史协会,开始授予博士学位,历史学家越来越系统化地对主要原始材料进行收集、引用、批判。这种职业化有着积极的作用:成功地勾勒出自早期中世纪时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演进的轮廓,以及对古代欧洲史学的积极改进。然而,历史学的职业化也带来了负面作用。历史研究、特别是英语世界和德语世界的历史研究中被注入了难以让人置信的、贫乏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就是要发现新颖的事实,对细节极度偏爱。自然,这些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专家而不是为公共群体而写作;他们缺乏对历史探询目的

① 当代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

② “在最通常的意义上,职业化(Professionalism)是一整套这样的机构,它是可以让成员谋生的职业,同时也可以支配成员的工作”。见 Eliot Freidson, *Professionalism: The Third Logic*, Cambridge, 2001, p.17。